

听证会有“戒备”：是开门纳谏的节奏吗



相关组织者更应该端正对听证会的态度和认识，听证会不是想开就开、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而是有《价格法》、《立法法》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作为依据，听证代表也好、媒体也罢，都不是来挑刺儿的，而是共同致力于相关决策的过程更公开透明，听证的结果更科学、更让人信服。

河南郑州的一场水价调整听证会近日成了新闻热点——据8月9日央广报道，

□本报评论员 林琳

此次听证的两套方案中，水价均有不小的涨幅，许多带着疑问赶往现场的记者被拒之门外，原因是没有事先报名，且媒体名额已满。而听证会现场门外，多名身着带“特勤”字样制服的人员以及多名民警的“把守”让气氛紧张、尴尬。郑州市物价局一官员事后接受采访时“涨价是政府的一个工作职能”的表态更成为舆论“槽点”。

客观而言，这场听证会之所以引起关注，并非某个官员不合时宜的某句话，而是它透露出来的一些紧张氛围。比如，不少记者被拒之门外。官方说法是，他们早就对听证会进行了公告，旁听要报名。所以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等10多家媒体无法进入。比如，听证会门口那些足以把门完全封堵的保安和警察。比如，进入听证会现场采访的记者表示，媒体和听证会代表进入会场有不同的通道，媒体区

与代表区之间有桌子以及花盆等隔离物，记者无法接触到听证会代表，现场使用录音设备也一度受阻。

近年来国人对听证这项制度已不陌生。对那些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决定，应当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——在价格决策、地方立法、行政处罚、国家赔偿等众多领域，听证会的形式被广泛采用。尽管这项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一些不完美，听证会“听证会”、“涨价会”的质疑声不绝于耳，但人们对其基本形式大体是知晓的，对其基本认识也是明确的。

“听”，倾听有关各方的主张、意见；“证”，表达主张要有证据支撑。听证，既体现了公平、公正与公开透明的价值追求，又反映出行政主体在依法行政中的决策理性和民主。可见，听证会本是一个广开言路、

集思广益的过程，应该尽可能展现出行政机关开门纳谏、有容乃大的姿态，而不该是“秘密”会，更不该“闭门造车”。

由是观之，郑州的此番水价调整听证会开得让人有些费解——开门纳谏的事情怎么就不能做得亮堂堂？公开听证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邀请媒体参加？涉及全市水价且涨幅不小，难道不该让公众听到多方论证的声音？媒体不是“洪水猛兽”，对相关重大事项给予报道也是其工作职能之一，为什么采访会受阻？

听证会，公众见多了，但警察、保安一起“严防死守”的听证会确实没见过。这种姿态只会让公众产生负面联想，甚至会对听证结果提出异议。说得再远一点儿，这可能影响今后当地召开类似听证会的效果和意义，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。

从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的视角，听证会制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和途径。人们期待，通过听证会，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充分代言和展现，各方都能坦诚相待，用事实和数据说话，而不是靠权力施压或者企业哭穷。相关组织者更应该端正对听证会的态度和认识，听证会不是想开就开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，而是有《价格法》、《立法法》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作为依据；听证代表也好、媒体也罢，都不是来挑刺儿的，而是共同致力于相关决策的过程更公开透明，听证的结果更科学、更让人信服。

在强调依法行政、政府职能转变的情况下，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和部门都应充分理解听证会制度的善意和初衷，也应该深知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定位，为其实现的充分挥洒“添柴”而不是“撤火”。

“低头族”隐患多

据《现代快报》报道，近日，家住江苏南京永阳镇的王大妈，因走路低头看手机，掉进了小区门前的窨井里，右脚多处骨折。为此，她将物业、维修师傅以及一名业主告上法庭。经法院判决，相比几名被告，王大妈自己担责最多。

如此结果多少有些让人惊讶，然而这也恰恰证明：如果不增强自身安全意识，外界的安保措施再怎么完善都等于零。如今不少人走路、乘车甚至吃饭都手机不离手，如此不分场合地与手机过分亲密，有时是对他人的不尊重，有时则容易引发卡顿、坠落等意外，有时还可能被不法分子盯上。“低头族”们该醒醒了，别等搭上自身安全和性命才追悔莫及。

健康证也能买？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报道，在北京市某体检中心，居然有人出售健康证，不用检查，不用抽血，只要交200元就能办一本真的健康证。拿着这本健康证到家政服务中心应聘保姆，有的家政中心根本不要求出示，有的则草草看了一眼封面就顺利“放行”。

在餐饮、家政等特殊行业，办理健康证已是基本规则，然而健康证办理标准不规范，渠道不统一，证件难以联网查询真伪等问题一直存在，客观上让一些人有机可乘，这也为相关服务的安全卫生带来隐患。相关部门应当尽快着手细化健康证分类，增加验证码手段。

小学生学哲学

据《光明日报》报道，近日，江苏扬州梅岭小学西校区决定，今年秋季开设哲学课，并将其作为三至六年级学生的必修课，与语文、数学同等地位。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有人质疑，哲学晦涩难懂，儿童难以接受；也有人认为，哲学有益，启迪心智应从娃娃抓起。

前些年，有人质疑小学生连汉语拼音都没掌握好，学外语是否太早了，如今对小学开设哲学课的争论也不乏各种“殷切”考量，在提倡素质教育、创新教育的当下，学什么，怎么学其实并不该有一定之规，任何有益于学生身心发展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都值得鼓励和尝试。只要有科学合理的切入方式和引导手段，能让孩子们遇事不再诉诸经验直觉，而是多些理性思考，学点哲学未尝不可。

□韩超

萤火虫之“恋”？

据《现代快报》报道，8月6日，一个题为“抵制金山湖萤火虫展”的帖子在镇江网友之家引发热议，截至8日晚已有近3万人次的点击量。记者向主办方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求证，对方回应称，所展示的萤火虫是外地一培育养殖基地供应的，不会伤害萤火虫。

如果这些萤火虫都是被活生生捉来的，只为商家搞噱头赚钱、游人观瞻一乐，未免有些残忍。这种萤火虫展，不少地方都举办过，每一次都会引发质疑，不管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。其实，表达和象征爱情的信物可以有多种，为什么有人偏偏要恋萤火虫？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”，用它来说萤火虫可能有些小题大做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自然界的物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，人类实在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欲随意去增加或者减少它们的数量，打破某种平衡。

□李法明/图 林琳/文



告别贫穷才能告别“无妈乡”

□舒圣祥

“无妈乡”是湖南省邵阳县黄荆乡的另一个称谓，那里有100多个“失母儿童”——据8月9日《中国妇女报》报道，该校在校“失母学生”131人，其中母亲逃婚与改嫁的有116人。驱使母亲出走的原因不仅仅是贫困，还有家庭暴力、丈夫懒惰等。而这些出走的妈妈，不少都是被人贩子卖到黄荆乡的。

阅读“无妈乡”的故事，好像是在聆听一个遥远的传说，但它却是真实发生的，而且就在此时此刻。当“妈妈”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称呼，成为一个地方孩子们的最大禁忌，当“你妈妈不见了”成为当地孩子们最敏感的话语，可以想象那里的童年该有多么不幸，那样的成长该有多么欠缺，那样的人生又将有多么“营养不良”。如果没有得力的“救援”和改变，“无妈乡”留给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未来？

当外界普遍将“无妈乡”想象为“母爱的本能被贫困击溃”时，记者的实地走访为这些出走的妈妈们正了名。貌似无情无义的抛夫弃子行为背后，隐藏着她们多少悲辛与不幸，她们只是尝试着给自己不幸的人生做一点改变，她们不是我们想当然的“坏女人”、“坏妈妈”。被人贩子拐卖到陌生而贫困的黄荆乡，嫁给一个好吃懒做毫无上进心的男人，还要时时遭遇各种家庭暴力，这种地狱般的日子没有不尽力挣脱的理由。

驱使母亲出走的，肯定不仅仅是贫困；该承担责任的，也绝不仅仅是那些母亲。

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但反过来想，黄荆乡那些好吃懒做的男人，以及动不动就打老婆孩子的粗鲁，又真的只是“坏男人”、“坏爸爸”的问题吗？恐怕也不是。最可怕的恐怕还是一种贫困，是让习惯了贫困的人们完全失去改变的希望，并且最终安于贫困。“无妈乡”那些丢了老婆的男人，似乎也是如此。当好吃懒做、暴打老婆成为群体性的现象，显然还有值得深思的因素。

经济的贫困，教育的落后、眼界的缺失、希望的破灭，凡此种种其实都可以用来解释那些“坏男人”、“坏爸爸”的异常表现。所以，“无妈乡”的问题，归根到底还是发展的悲剧。作为被发展遗忘的贫穷角落，尝试对“无妈乡”进行各种“归罪”，追问到底该怪“坏女人”还是“坏男人”，其实并没有太多意义。要改变现状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贫困的面貌，要么从外面引入“活水”，要么组织那里的男人“走出去”。

给予机会与自身勤劳，开阔眼界与重燃斗志，往往是改变的开始。扶贫绝不只是每年给点钱，让他们可以借此活下去。要让黄荆乡的孩子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在治懒、反家暴、打击拐卖妇女等方面完善制度当然重要，但是，当地贫困面貌如果迟迟不能改变，人们依然安于贫困而看不到出路，出走的妈妈们很难再回来。



□张贵峰

据8月9日《现代快报》报道，日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上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，提出“关于加强电视剧市场工作的几点建议”，其中包括，“要求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”等，引发业内广泛关注。

因为“电视媒体经营形势危急，购剧经费吃紧”，“三线卫视和地面频道普遍出现经营困难”，便建议“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”，未必可取。



靠插广告挣钱是舍本逐末

因，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告上。

很明显，恢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固然能暂时增加电视台的广告收入，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建立在破坏“剧情完整性和收视连贯性”基础上的收入增加，未必可持续——因为出于对插播广告的强烈反感，加之“网络和新媒体”提供的更丰富选择，越来越多的观众势必会选择放弃通过电视台观看电视剧。此前，有报告显示，一些地方的电视机开机率正在逐年下降。

从一般经营逻辑角度，希望通过增加广告收入缓解“经营困难”的逻辑，并没有太多

不合理。但要想让这一逻辑真正形成良性循环，其中的核心无疑在于，电视剧的质量、品质是否足够高。如果电视剧品质足够高，对观众具有充分吸引力，即便没有插播广告，每集电视剧前后播放的广告，仍能给电视台带来丰厚收入；反之，若电视剧质量不高，甚至堪称“烂剧”，那么即便允许插播广告，又能吸引多少广告商？据报道，尽管我国每年1万多集的电视剧产量已是世界第一，但“近一半没有平台播放”亦是事实。

这种背景下，电视剧制作部门不认真反思“有数量、缺质量”的问题，只想走“插播广告”的捷径，实在有些舍本逐末、诊不对症。



刘老庄连：82烈士书写悲壮抗战传奇

不朽的英雄番号

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

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某红军师“叶挺独立团”装备2营4连副指导员李彩慧，来自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。

李彩慧说，4连还有一个著名的称谓：刘老庄连。

“用一个村庄名为一个连队命名，在我军历史上并不多见。”入伍来到用自己家乡命名的英雄连队，让李彩慧感到十分荣耀。

荣耀的背后，是82烈士书写的悲壮抗战传奇。

1943年3月，日军突然集中兵力对我淮海地区展开大扫荡，妄图合围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，群众转移了，兄弟部队转移了，全连却弹尽粮绝，全部壮烈牺牲。

在强敌面前，82名将士浴血奋战，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进攻，毙伤日伪军300余人。最终，淮海区党政机关转移了，群众转移了，兄弟部队转移了。

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，烈士们仍保持着生前搏斗时的英姿：有的怒目圆睁，匍匐在战场上；有的紧握着弯曲了刺刀，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；有的双手还紧紧抓着敌人的耳朵……

如今，召果力的户口依旧在老家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，养子尼玛才仁则是青海大藏族一名普通职工。

1992年，小外孙女达什姐莉由于上小学，来到尕布龙身边。原以为可以“享福”的她，第一天就被公公当头泼了盆冷水，“晚上公公来叫我洗衬衣，我特别不愿意，当时就哭了。”达什姐莉说。

然而，达什姐莉的“磨难”还不止这些。小学三年级开始，自家“牧民店”里晚上洗碗的任务由她“包干”；从初中开始，每隔半个月，她还要和母亲召集一起清洗“牧民店”里的被褥。

“长期耳濡目染，我从小就明白，我是牧区的孩子，不该在吃穿上和同学攀比，就凭自己学习好、人缘好，就可以和大家愉快相处。”达什姐莉说。

2006年，达什姐莉大学毕业。在尕布龙一再坚持下，她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省城西宁，回到了家乡海晏县基层牧区工作，如今已在那扎根，有了自己的家庭。

2001年，尕布龙荣获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颁发的首届“母亲河奖”。

尕布龙走了，却仿佛从未离开。

“牧民店”的故事，在百姓中传颂；河曲草原曾经的“黑土滩”，如今绿草如茵；南北两山纤细的树苗，早已亭亭如盖，郁郁葱葱。

“老百姓就是他的天，老百姓就是他的地，老百姓就是他的生命之根。”青海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、传记文学《尕布龙传》作者德布·陈列奥赛说。

（上接第1版）

如今，尕布龙无论在职还是退休，做什么事，

（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）

（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）

帮忙。”时任尕布龙秘书的袁兆盛说。

1975年夏，时年35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原党支部书记尕布龙回忆：“2001年，沃卡阿吾（蒙古语：老大爷）尕布龙要去北京一趟，他叫我去西宁帮他收拾行李。走进房间，我眼睛湿润了：他总共只有两套外衣，一双七十年代的老式皮鞋，衬衣领子，袖口补了好几回。”

尕布龙一生没有亲生儿女，老伴花毛1962年就因病致残，1979年下肢完全瘫痪。

尕布龙养女召果力告诉记者：“我母亲的所有治疗费用，父亲一直都自掏腰包，不占公家便宜。为节省费用，从1979年在西宁做完手术，到2002年去世，母亲一直都是在海晏老家休养。”

如今，召果力的户口依旧在老家海晏县哈勒景乡永丰村，养子尼玛才仁则是青海大藏族一名普通职工。

直到2006年，由于尕布龙年事已高、肺心病加重，“牧民店”告一段落。据粗略估计，三十多年来，住过“牧民店”的群众，不下六七千人次。

1926年11月，尕布龙出生于海北州海晏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。1949年9月家乡解放，他于次年1月参加革命，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在生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，尕布龙深情地写道：“我曾是个放羊娃，在党的培养下，当上了副省级领导干部。我牢记党的宗旨，一生从没忘记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养育之恩，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。”

“我心里装满了老百姓的疾苦”

熟悉尕布龙的人都说，他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身边人，要求太严了。

（上接第1版）

由于“黑车”泛滥，由此引发的纠纷和投诉也频繁发生。近日，有市民投诉反映兰州西客站内“黑车”横行、漫天要价，在请求城管部门查处的同时，还提出了多条建议。但这位市民最后却得到了一条城管部门自我表扬的“神回复”，回复通篇都是该部门查处“黑车”的成绩单。市民无奈之下，只能致函当地媒体，此事公开披露后引发舆论一片哗然。

市民王伟在网络上评论认为，执法部门失去了市民的信任，由此导致了“黑车难治”

。

（上接第1版）

对此，当地舆论认为，“黑车”的大量出现，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的不足，变堵为疏、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“黑车”的根本之策。

对此，当地舆论认为，“黑车”的大量出现，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的不足，变堵为疏、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“黑车”的根本之策。

（上接第1版）

对此，当地舆论认为，“黑车”的大量出现，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的不足，变堵为疏、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“黑车”的根本之策。

对此，当地舆论认为，“黑车”的大量出现，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的不足，变堵为疏、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“黑车”的根本之策。

对此，当地舆论认为，“黑车”的大量出现，暴露出的是客运出租业管理的缺陷和正规出租车运力的不足，变堵为疏、加大正规出租车数量才是遏制“黑车”的根本之策。